中国语文 2022 年第 3 期(总第 408 期)

词缀的两个来源:词汇形态化与音节形态化*

——以回辉话名词前缀的来源为例

田 祥 胜

提要 经典理论认为,词缀来源于词汇词,是词汇形态化的结果。回辉话名词前缀 na^{11}-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但是回辉话名词前缀 $ʔa^{11}$-与 hu^{11}-并非来源于词汇词,而是来源于原始占语不表意义的第一音节,是音节形态化的结果。词缀形成后语音还会磨损,甚至语音化(词缀消失后变成单纯的语音片段)。在青少年回辉话里,na^{11}-变成了 $nə^{11}$-,$ʔa^{11}$-与 hu^{11}-开始大量消失。$ʔa^{11}$-与 hu^{11}-的消失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系统中出现新的声调对立,二是词缀的意义消失,三是词缀的功能在部分词中通过声调得到保留。这与非声调语言的语音化并不完全相同。

关键词 回辉话 词缀 词汇形态化 音节形态化 语音化

1. 引言

Givón(1971)有一句名言:"如果今天的黏着语素是昨天的词汇词(lexical words),那么今天的形态就是昨天的句法。"这里的黏着语素主要是指词缀(affix),包括屈折(inflectional)词缀与派生(derivational)词缀。前者如班图语的动词后缀-ba/-bamos(如 compra-ba"我曾经买过"、compá-bamos"我们曾经买过"等),后者如英语的动词前缀 en-(如 en-tomb、en-circle、en-close 等)。-ba/-bamos 来源于动词 ir"去",en-来源于名词前的介词 *en*。

Joseph 和 Janda(1988:196-197)把词汇词演变成词缀的现象归入句法形态化①。为了更加准确地称说,我们把这种演变过程称作词汇形态化。Trask(1996/2000:115)指出,"(词的)形态化极其普遍,实际上语言学家断言所有的黏着语素都仅仅源于这种方式。"Hopper 和 Traugott(2003/2005:142)在分析大量语言现象之后,提出了"词汇项(lexical item)>附缀(clitic)>词缀(affix)"的词缀形成路径。然而,是不是所有的词缀都来源于词汇词?下面以回辉话名词前缀的来源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回辉话语法演变研究"(18BYY209)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陈保亚及陆俭明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中国语文》匿名评审专家也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如有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① Joseph 和 Janda(1988:196-197)指出,形态化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从语音到形态,二是从句法到形态。前者可称为语音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 of an originally phonologically conditioned process),后者可称为句法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 of syntax)。不过,他们说的语音形态化只包括语音交替(umlaut)、语音重叠(reduplication)、重音变化(accent shifts)等现象,并没有提到语音演变成词缀的情况。

2. 回辉话名词前缀 na^{11}-、ʔa^{11}-、hu^{11}-

回辉话(Tsat)在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回辉及回新两个社区通用。经过论证,它与南岛语系(Austronesian)马来—玻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马来—占语支(Malayo-Chamic)的语言具有亲缘关系(Benedict,1941;郑贻青,1986、1997;Thurgood,1999;江荻,2010;曾晓渝、尹世玮,2011;Thurgood 等,2014;田祥胜,2017;田祥胜、陈保亚,2019)。不过,与其他多音节(主要为双音节)无声调的占语语言相比,现代回辉话是单音节有声调语言,真单音节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原始占语多音节的最后一个音节。例如(以动物名词为例):

表 1　回辉话音节来源举例②

类别		义项	PC	CFD	NR	PR	Chru	Rade	Tsat
I		鱼	* ʔikan	akan	ikaːt	ikan	akaːn	akan	kaːn^{33}
		鸭子	* ʔada	adā	ada	aṭa	ada	ada	tha^{11}
		马	* ʔaseh	asɛh	aseh	athɛh	asɛh	asɛh	se^{33}
		羊	* bubɛ	pabaij	mube	papɛ	pəbɛ	be	phe^{11}
		蜜蜂	* huni	hani	huni	hani	həni	hnue	ni^{33}
		鸡	* manuʔ	mənuk	manūʔ	mi̱nŭʔ	mənŭʔ	mnŭ	nok^{24}
II	A	兔子	* tarapay	tapai	tarapai	tapaj	tərpaːi	pai	paːi^{33}
		虾子	* hudaːŋ	hadaŋ	hudaːk	haṭăŋ	——	hdaŋ	thaːŋ^{11}
	B	蚯蚓	* lanaŋ	ɡanaŋ	lanak	lanĭŋ	lənaːŋ	enăŋ	naːŋʔ^{32}
		老鼠	* tikus	takuh	tukuh	takŭh	təkuːh	kˈkuih	ku^{55}
	C	虱子	* kutɔ̆w	ɡatău	kutəu	katɔ̆w	kətəu	ktâo	tau^{11}
		蜗牛	* ʔabaw	——	abau	apaw	abau	abao	phaːu^{11}

在现代各占语语言里(不包括回辉话),表 1 中的各项都可以单说,是词。但是在回辉话里,只有 I 类中各项可以单说,而 II 类中各项是不可以单说的。II 类中的各项只有在前面加上一定的附加成分才可以单说:II(A)中的 paːi^{33} 和 thaːŋ^{11} 只有在前面加上 na^{11}-(也有人读作[la^{11}])以后(na^{11}paːi^{33}"兔子",na^{11}thaːŋ^{11}"虾子")才可单说;II(B)中的 naːŋʔ^{32} 和 ku^{55} 只有在前面加上 ʔa^{11}-以后(ʔa^{11}naːŋʔ^{32}"蚯蚓",ʔa^{11}ku^{55}"老鼠")才可以单说;II(C)中的 tau^{11} 和 phaːu^{11} 只有在前面加上 hu^{11}-(有时读作[u^{11}])以后(hu^{11}tau^{11}"虱子",hu^{11}phaːu^{11}"蜗牛")才可以单说。也就是说,在回辉话里,II 类中的各项并不是词,而是词的构成成分。

从对比的情况来看,这种构词成分应是词根语素。原因在于:

第一,从跨语言的比较来看,在占语里,词义通常由多音节词中的最后一个音节来表达。例如在西部占语(柬埔寨占语)及东部占语(越南藩朗语)里,双音节词中的第一个音节往往可

---

② PC 为原始占语(Proto-Chamic),CFD 为《占法词典》(Dictionnaire Čam-Français,Aymonier 和 Cabaton,1906),NR 为北拉格莱语(Northern Roglai),PR 为藩朗占语(Phan Rang Cham),Chru 为楚鲁语,Rade 为拉德语,Tsat 为回辉话。本文中原始占语、北拉格莱语、藩朗占语以及楚鲁语的材料均来自 Thurgood(1999:277-364),拉德语来自 Tharp 和 Buôn-yă(1980),回辉话来自笔者的调查。调查历经 7 年(2014 年 7 月-2021 年 10 月)。本文回辉话的语料主要来自赵司荣、金日文、赵小卫以及赵婕。赵司荣,男,三亚回族,1938 年 1 月生,农民,三亚市天涯区回辉社区九小组。金日文,男,三亚回族,1954 年 1 月生,农民,三亚市天涯区回辉社区一小组。赵小卫,男,三亚回族,1978 年 8 月生,司机,三亚市天涯区回辉社区三小组。赵婕,女,三亚回族,2002 年 8 月生,大学学生,三亚市天涯区回辉社区三小组。

以省略，从而变成只保留第二个音节的单音节词。例如 agha“根”可以说成 gha，urang“人”可以说成 rang，hamia“杨桃”可以说成 mia 等。（Moussay，2006：96）从表 1 可以看出，回辉话中的单音节都与占语多音节（原始占语及现代占语）中的最后一个音节形成语音对应，这表明回辉话Ⅱ中的这些单音节也是语义的表达者。

第二，从语言内部比较来看，Ⅱ类中各项跟Ⅰ类中各项都来源于原始占语多音节中的最后一个音节。既然Ⅰ类中的各项都能表达语义，那么Ⅱ类中的各项也应能表达语义。

第三，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尽管Ⅱ类中的各项不能单说，但是回辉人都知道它们的具体意义，这种情况跟现代汉语中的“虎”“鼠”“鹰”是一样的，尽管“虎”“鼠”“鹰”不能单说，但是汉语者都知道它们的意义。相反，与Ⅱ类组合的 na^{11}-、$ʔa^{11}$-、hu^{11}-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构词。因此，从以上三点来看，回辉话Ⅱ类中的各项应是词根语素。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 na^{11}-、$ʔa^{11}$-、hu^{11}-的性质。对于 na^{11}-、$ʔa^{11}$-、hu^{11}-的性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欧阳觉亚和郑贻青（1983）没有给出确切的名称，他们只是说这是一种附加成分。倪大白（1988）认为它们是一种前缀。李炳泽（1995）认为它们是一种类前缀（只是古占语第一音节的残留，不表达意义）。Thurgood 等（2014：169－171）认为它们是类属语（Class terms），是分类词（classifier）的一种③。下面将从分布、功能以及意义上来分析它们的性质。

从分布上看，na^{11}-、$ʔa^{11}$-、hu^{11}-只能粘附于名词词根之前，不能处在词根之后。从功能上看，它们的作用是构词。通常情况下，与它们组合的词根是一种不成词语素。这些不成词语素的词根只有与它们组合以后才能构成新词。成词以后，大多数词的意义与词根的意义基本相同。如 ku^{55} 与 $ʔa^{11}ku^{55}$ 都能表达“老鼠”的意思，区别在于前者不能单说，是不成词语素，后者能够单说，是词。从意义上看，它们只能表达抽象的意义而不能表达具体的意义（具体情况见第 3 节）：na^{11}-通常表达“小的”意义，如 $na^{11}tɕiau^{24}$“小鸡”、$na^{11}li^{33}$“戒指”、$na^{11}min^{33}$“痱子”等，都是比较小的东西；$ʔa^{11}$-用于动物名词时通常表达“令人讨厌的”意义，如 $ʔa^{11}paːn^{11}$“蜈蚣”、$ʔa^{11}thiaːŋʔ^{21}$“蝎子”、$ʔa^{11}lau^{24}$“蟑螂”等，都是让人讨厌的动物；hu^{11}-通常表达“圆的”意义，如 $hu^{11}phaːu^{11}$“蜗牛”、$hu^{11}ɓu^{24}$“膝盖”、$hu^{11}koi^{24}$“橘子”等，都是圆形的东西。

粘附于词根、与词根语素一起构成新词以及意义较虚是词缀的典型特征（参看刘丹青，2017：564-566），所以 na^{11}-、$ʔa^{11}$-、hu^{11}-应是词缀。而它们又只能作名词的前附成分，所以它们是名词前缀。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名词前缀来源于何处？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

3. 前缀 na^{11}-、$ʔa^{11}$-、hu^{11}-的来源与形成

通过对比，Thurgood 等（2014：169-171）认为回辉话的前缀 na^{11}-来源于原始占语的 * ʔina

---

③ 根据 Delancey（1986），Aikhenvald（2000：81）等人的分析与描述，类属语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通常为实语素，语义比较明确；二是标识的名词类别比较单一；三是语素间通常构成修饰关系。如 Thurgood 等（2014：165）把回辉话 $phun^{33}zau^{33}$“树木”，$phun^{33}pa^{33}$“木棉树”，$phun^{33}saːn^{33}$“杉树”，$phun^{33}phiaŋ^{11}$“苎麻”，$phun^{33}ŋa^{33}$“榕树”中的 $phun^{33}$ 看成是类属语，显而易见，这里的 $phun^{33}$ 意义明确，主要表示“树”的意思；标识的类别单一，主要用来标识木质（纤维性）植物；与后面的语素不是附加关系而是修饰关系（中心语+定语）。而 na^{11}-、$ʔa^{11}$-以及 hu^{11}-并不具有上述特征，一是它们的语义比较模糊，不易确定；二是它们标识的事物比较多样，如由 hu^{11}-构成的词表种族、职业、动物，水果、工具、疾病、身体器官等（见第 3 节）；三是它与后面的语素之间是附加关系而不是修饰关系。因此，na^{11}-、$ʔa^{11}$-与 hu^{11}-不宜看作类属语，最起码不宜看作典型的类属语。

“母亲、母的、主要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前缀 ʔa^{11}-与 hu^{11}-的来源。他们找不到 ʔa^{11}-与 hu^{11}-来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占语里（包括原始占语与现代占语）没有发现 ʔa^{11}-与 hu^{11}-作名词前缀的现象；二是认为前缀应来源于词汇词。例如他们把 ʔa^{11}sau^{33}“狗”中的 ʔa^{11}-排除在前缀之外，理由是这里的 ʔa^{11}-仅仅是一个音节，是原始占语 * ʔasɔw^{33}“狗”第一音节 * ʔa-的残留。下面我们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讨论 na^{11}-、ʔa^{11}-、hu^{11}-的来源与形成。

3.1 前缀 na^{11}-的来源与形成

在回辉话中，na^{11}作前缀时主要粘附在一些身体器官、器物及一些动物词根的前面。具体情况如下：

器官或疾病：na^{11}ɗiaɪŋʔ^{32}“手指”，na^{11}ɗiaɪŋʔ^{32}kaɪiʔ^{32}“脚趾”，na^{11}ŋa^{33}“耳朵”，na^{11}zu^{55}“癣”，na^{11}ɗut^{24}“酒窝”，na^{11}min^{33}“痱子”，na^{11}ʔiaɪuʔ^{32}“粉刺”

器物：na^{11}kho^{42}“饭锅”，na^{11}uət^{24}“抽屉”，na^{11}tse^{33}“坛子”，na^{11}kɔk^{24}“瓶子”，na^{11}ɕi^{11}“钥匙”，na^{11}pu^{11}sau^{24}ʔia^{24}“尿布”，na^{11}li^{33}“戒指”，na^{11}vaɪŋʔ^{32}“镰刀”，na^{11}kuaɪŋʔ^{32}“箩筐”，na^{11}phu^{24}“本子”，na^{11}kai^{33}“连环画”，na^{11}phaɪŋ^{11}“锡”，na^{11}ku^{55}“门闩”，na^{11}tɕit^{24}“匕首”，na^{11}khiə^{55}“小刀”，na^{11}tsoŋ^{11}“杯子”，na^{11}uat^{24}“盒子”，na^{11}phuaɪn^{11}“盘子”，na^{11}saɪn^{11}“碟子”，na^{11}va^{24}“勺子”，na^{11}ɓet^{42}“钱包”，na^{11}nuai^{33}“鱼篓”，na^{11}khe^{11}“木筏”，na^{11}ɕi^{24}“耳环”，na^{11}khioɪŋ^{11}“项圈”，na^{11}zien^{11}“药片”，na^{11}sai^{11}“铁丝”，na^{11}ɓə^{11}“小布袋”，na^{11}ʔi^{33}“筛子”，na^{11}phoŋ^{11}“篱笆”，na^{11}ŋau^{33}“铜丝”，na^{11}khioŋ^{11}“铃铛”

动物：na^{11}kia^{33}“猴子”，na^{11}tsun^{33}“鸟”，na^{11}tsun^{33}la^{33}“麻雀”，na^{11}pio^{24}“松鼠”，na^{11}tat^{24}“鹧鸪”，na^{11}tsun^{33}pui^{33}“燕子”，na^{11}ŋaɪnʔ^{32}“孑孓”，na^{11}ʔit^{24}“泥鳅”，na^{11}ku^{33}“乌龟”，na^{11}tɕiau^{24}“小鸡”，na^{11}paɪi^{33}“兔子”，na^{11}khiet^{42}“龙”，na^{11}sa^{33}“鹿”，na^{11}thaɪŋ^{11}“虾”，na^{11}thaɪŋ^{11}vaɪŋ^{11}“对虾”，na^{11}thaɪŋ^{11}poɪŋ^{33}“海虾”，na^{11}ŋai^{55}phia^{42}“鱼仔”，na^{11}zi^{24}“巴鳎”，na^{11}nan^{33}“角鱼”，na^{11}ʔio^{33}“多鳞鲀”，na^{11}puan^{33}“吉打鲹”，na^{11}lo^{11}“明太鱼”，na^{11}via^{42}“三文鱼”，na^{11}naɪiʔ^{32}“单带绯鲤”，na^{11}senʔ^{21}“短钻嘴鱼”，na^{11}ɕi^{33}“六齿金线鱼”，na^{11}ʔe^{33}“四线天竺鲷”，na^{11}mə^{24}laɪŋ^{33}“乌贼”，na^{11}kaɪn^{33}pioɪŋʔ^{32}ko^{24}“蝌蚪”

我们认同 Thurgood 等（2014）关于 na^{11}-来源的观点。原因在于：

第一，从 * ʔina 到 na^{11}符合回辉话中单音节主要来源于原始占语多音节中最后一个音节的语音演变规律。

第二，在回辉话中，na^{11}除了作前缀外，还能作词根。例如 ʔa^{11}na^{11}“奶奶、外祖母”，ʔa^{11}na^{11}ɗot^{42}“曾祖母”等。当 na^{11}作词根时，它的意义与 * ʔina“母亲、母的、主要的”意义相近。

第三，东、西部占语以及北拉格莱语（Northern Roglai）分别有 inōˈ/inā 可以用作名词的词缀。例如在北拉格莱语里，inā viaq 表示一种由 viaq 的叶子制作而成的菜，此时 inā 并不表任何具体意义，为名词的前缀（Thurgood 等，2014：164-165）。

基于以上原因，na^{11}-应来源于原始占语词汇词 * ʔina“母亲、母的、主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表“母亲、母的、主要的”义的 * ʔina 是如何演变成名词前缀的？下面我们以东、西部占语、北拉格莱语以及回辉话的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东、西部占语里，inōˈ可以与别的名词一起构成并列或偏正关系词组。例如amōˈ inōˈ（父亲+母亲）“父亲和母亲”，limoˈn inōˈ（大象+母的）“母象”，inōˈ noˈgar（女神+国家）“国家女神（la déesse Mère du royaume）”等说法（Aymonier 和 Cabaton，1906：30）。这些说法中的 inōˈ 分别为“母亲”“母的”以及“主要的（一国之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 inōˈ 的基本意义。

在东、西部占语里，inōˈ还可以分别处在taṅin“手”及 takai“脚”的前面，构成inōˈ taṅin“大拇指”及inōˈ takai“大脚趾”等词（Aymonier 和 Cabaton，1906：30；Moussay，1971：115）。这里的 inōˈ可以理解为“手之母”及“脚之母”，不过这种理解比较牵强。除此之外，inōˈ 还可以处在saṅ

“房屋”以及kajaṅ“茅草房”的前面，构成inō' saṅ“屋脊”、inō' kajaṅ“脊檩”等词。这里的inō'可以理解为“房屋之母”或者“房屋的主要部分”。相对于“手之母”及“脚之母”来说，这种理解就更加牵强了。这说明，当inō'处在身体器官的名词前，语义已经虚化了，当它处在器物的名词前，语义虚化的程度更高了。当语义虚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变成名词的前缀，如北拉格莱语的前缀 inā-④与回辉话的前缀 na^{11}-。与东、西部占语相比，inā-/na^{11}-除了可以出现在身体器官及器物的名词前，还可以出现在动物名词前。这说明 inā-/na^{11}-扩张是按照“身体器官>器物>动物”的顺序进行的。

在回辉话里，由 na^{11}-构成的大多数名词所指称的对象都是比较小的（北拉格莱语也一样，参看 Thurgood 等，2014：167）。以器官及疾病为例，na^{11}ɗiaːŋʔ^{32}“手指”，na^{11}ɗiaːŋʔ^{32}kaːiʔ^{32}“脚趾”，na^{11}ŋa^{33}“耳朵”，na^{11}ɗut^{24}“酒窝”，na^{11}zu^{55}“癣”，na^{11}min^{33}“痱子”，na^{11}ʔiaːuʔ^{32}“粉刺”都是比较小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与 na^{11}-最先出现的语言环境有关。从东、西部占语来看，na^{11}-最初是与手、脚这样的词组合的，来表示手指与脚趾，尽管它们具有“手之母”与“脚之母”这样的意义，但是手指与脚趾却都是比较小的事物。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 na^{11}-具有“小的”意义。

综上所述，回辉话的名词前缀 na^{11}-应来源于原始占语的词汇词 * ʔina“母亲、母的、主要的”，是词汇形态化的结果。

3.2 前缀 $ʔa^{11}$-的来源与形成

回辉话中，$ʔa^{11}$-主要用在亲属称谓词、动物名词和人及鬼神的名词中。具体情况如下：

亲属称谓：$ʔa^{11}$kai^{55}“爷爷”，$ʔa^{11}$na^{11}“奶奶”，$ʔa^{11}$pa^{55}“父亲”，$ʔa^{11}$ma^{33}“母亲”，$ʔa^{11}$ɓa^{11}“伯父”，$ʔa^{11}$ma^{55}$ʔa^{11}$ɓa^{11}“伯母”，$ʔa^{11}$ze^{11}“叔父”，$ʔa^{11}$niaːŋ^{11}“叔母”，$ʔa^{11}$ma^{55}“姑姑比父大”，$ʔa^{11}$maːi^{11}“姑姑比父小”，$ʔa^{11}$ma^{42}“姑父比父小”，$ʔa^{11}$khiu^{55}“舅舅”，$ʔa^{11}$ko^{55}“哥哥”，$ʔa^{11}$saːu^{11}“嫂子”，$ʔa^{11}$tɕiə^{55}“姐姐”，$ʔa^{11}$thai^{11}“弟弟”，$ʔa^{11}$ko^{55}$ʔa^{11}$thai^{11}“堂兄弟”

动物：$ʔa^{11}$la^{33}“蛇”，$ʔa^{11}$la^{33}saːn^{11}ku^{11}pho^{11}“灰蛇不咬人”，$ʔa^{11}$la^{33}pui^{33}“火蛇”，$ʔa^{11}$la^{33}no^{24}“海蛇”，$ʔa^{11}$la^{33}ʔiaŋ^{33}“竹子蛇”，$ʔa^{11}$la^{33}thu^{42}ti^{55}thu^{42}taːnʔ^{32}“黑白蛇”，$ʔa^{11}$la^{33}va^{24}“眼镜蛇”，$ʔa^{11}$la^{33}tiaːŋʔ^{32}khien^{11}“眼镜王蛇”，$ʔa^{11}$lo^{11}“蜥蜴”，$ʔa^{11}$naːŋʔ^{32}“蚯蚓”，$ʔa^{11}$naːŋʔ^{32}“蛔虫”，$ʔa^{11}$ta^{55}“水蛭”，$ʔa^{11}$paːn^{11}“蜈蚣”，$ʔa^{11}$thiaːŋʔ^{21}“蝎子”，$ʔa^{11}$lau^{24}“蟑螂”，$ʔa^{11}$than^{11}ɲoŋ^{11}“蜣螂”，$ʔa^{11}$la^{24}“虫子”，$ʔa^{11}$lau^{24}“壁虫”，$ʔa^{11}$tso^{24}khiə^{55}“蛄蝼”，$ʔa^{11}$ku^{55}“老鼠”，$ʔa^{11}$than^{11}“蚂蚁”，$ʔa^{11}$sau^{33}“狗”

人及鬼神：$ʔa^{11}$lau^{11}khat^{24}“哑巴”，$ʔa^{11}$zoi^{33}“疯子”，$ʔa^{11}$zoi^{33}$ʔa^{11}$poi^{33}“傻子”，$ʔa^{11}$la^{24}“仆人”，$ʔa^{11}$lo^{33}ko^{24}phia^{11}“乞丐特指汉族人”，$ʔa^{11}$la^{55}phai^{11}“懒汉”，$ʔa^{11}$tau^{33}“鬼”

通过对比，我们无法找到演变成 $ʔa^{11}$-的某一个具体的原始占语词汇。李炳泽（1995）曾认为，回辉话的名词前缀来源于古代占语的第一音节，是古代占语第一音节趋同后的残留。虽然这种看法不适用于 na^{11}-，但适不适用于 $ʔa^{11}$-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比较一下回辉话与占语中的同源词（表 2，见下页）。

从表 2 来看，前缀 $ʔa^{11}$-应是原始占语第一音节趋同后的残留。原因在于：

第一，这些带有前缀 $ʔa^{11}$-的名词在原始占语中都是双音节词（有些词没有构拟形式，但是从 CFD 一栏里可以推知其双音节形式），这为第一音节的残留提供了条件。

---

④ Thurgood 等（2014：167）说，他们通过与 Ernest Wilson Lee 私下交流得知，在北拉格莱语中 inā-也可以和大量小动物、手指及脚趾用在一起。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例子。本文暂且认可这一说法。

表 2　回辉话前缀 ʔa^{11}-名词与占语同源词的比较

类别	义项	PC	CFD	NR	PR	Chru	Rade	Tsat
亲属称谓	父亲⑤	* ʔama	amŏ^{l}	ama	amɨ	ama	ama	ʔa^{11}ma^{33}/pa^{55}
	母亲	* ʔina	anŏ^{l}	——	inɨ	——	ana	ʔa^{11}na^{33}/ma^{33}
	弟、妹	* ʔadɛy	adĕi	adəi	aṭĕj	adəi	adei	ʔa^{11}thai^{11}
动物	狗	* ʔasɔw	asău	asəu	athɔ̆w	asəu	asâo	ʔa^{11}sau^{33}
	蛇	* ʔular	alā	ula	ala	ala	ala	ʔa^{11}la^{33}
	蚂蚁	* sidəm	hadam	sidəp	haṭăm	adəm	hdăm	ʔa^{11}than^{11}
	蝎子	——	adĭəŋ	——	——	——	——	ʔa^{11}thiaːŋʔ^{21}
	虫子	* hulat	halak	hulaʔ	halăʔ	həlaʔ	hluăt	ʔa^{11}la^{24}
	蜈蚣	* limpaːn	lapan	lupaːt	lipan	ləpaːn	epan	ʔa^{11}paːn^{11}
	蚯蚓	* lanaŋ	ganaŋ	lanak	lanĭŋ	lənaːŋ	enăŋ	ʔa^{11}naːŋʔ^{32}
	水蛭	* lintah	latah	ritah	lităh	lətah	etah	ʔa^{11}ta^{55}
	老鼠	* tikus	takuh	tukuh	takŭh	təkuːh	k^{l}kuih	ʔa^{11}ku^{55}
	蛔虫	——	ganaŋ	——	——	——	——	ʔa^{11}naːŋʔ^{32}
	蟑螂	——	kalap	——	——	——	kpriăp	ʔa^{11}lau^{24}
人及鬼神	鬼	* ʔantɔw	atău	atəu	atɔ̆w	atəu	mtâo	ʔa^{11}tau^{33}
	懒汉	* ma-alas	alah	alah	alah	alah	alah	ʔa^{11}la^{55}
	仆人	——	halak	——	——	——	——	ʔa^{11}la^{24}
	疯子	——	hanroi	——	——	——	——	ʔa^{11}zoi^{33}

第二，从原始占语（PC）、《占法词典》（CFD）⑥及回辉话（Tsat）来看，在回辉话中原始占语第一音节应经历了 * C_/-[* i/ * u/ * a]>Ca->ʔa^{11}-/a^{11}-（在回辉话中，ʔa^{11}-与 a^{11}-不对立，ʔa^{11}-也可记为 a^{11}-，本文记为 ʔa^{11}-）的演变。也就是说，在回辉话中，前缀 ʔa^{11}-的形成应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韵母 * i/ * u/ * a 趋同为[a]，即 * C_/-[* i/ * u/ * a]>Ca-，如《占法词典》所示；在第二阶段，声母（即辅音 C，如 * s，* l，* h，* t，* m，* ʔ 等）趋同为[ʔ]（记为 ʔa^{11}-时）或脱落（记为 a^{11}-时），即 Ca->ʔa^{11}-/a^{11}-。

第三，原始占语第一音节的这种语音演变在现代占语里可以观察得到。如在藩朗占语（PR）中，* tikus“老鼠”、* hulat“虫子”、* ʔular“蛇”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演变，第一音节分别变成 ta-、ha-、a-，即第一音节中的 * i/ * u/ * a 都趋同为[a]。在楚鲁语（Chru）中 * sidəm“蚂蚁”已演变成 adəm，在各占语中 * ma-alas“懒汉”都演变成了 alah，也就是说，这两个词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的演变，即声母 * s 及 * m 已经趋同或脱落⑦。

---

⑤　回辉人现在称父亲为 ʔa^{11}pa^{55}，称母亲为 ʔa^{11}ma^{33}，这应该是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情，因为在 Benedict（1941：132）的文章中，记录的“父亲”为 mā，“母亲”为 nā（记录的为词根，目的是进行语音对比）。所以在早期的回辉话中，“父亲”应为 ʔa^{11}ma^{33}，“母亲”应为 ʔa^{11}na^{33}。现在回辉话中 ʔa^{11}pa^{55}“父亲”、ʔa^{11}ma^{33}“母亲”里的 pa^{55}与 ma^{33}应是借自汉语的“爸”“妈”。

⑥　《占法词典》（Dictionnaire Čam-Français）记录的不是某个地方共时状态下的占语，而是多地、历时状态下的占语。记录的词语来自早期的占语文献以及各占语语言（主要是东、西部占语，即柬埔寨占语及越南藩朗占语），因此有些词有多种语音形式。例如“老鼠”一词，有 takuh 与 tikuh 两种语音形式。（Aymonier 和 Cabaton，1906：165）表 2 只选择第一音节韵母为[a]的语音形式。

⑦　从演变的情况看，这两个阶段的音变应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的。（Wang，1969）也就是说，韵母趋同为[a]、声母趋同为[ʔ]或脱落是一个词一个词进行的。

其实并非只有表2中的词才经历过以上的演变过程。在藩朗占语和《占法词典》中，不少双音节词第一音节的元音都已演变为[a]了，如*ʔaseh“马”、*ʔikan“鱼”、*bubɛ“羊”等词在占法词典中分别为asɛh、akan与pabaij(具体见表1)。如果这些双音节词也经历过趋同的演变，那么为什么ʔa^{11}-在这些词中没有保留下来⑧？或者说，为什么ʔa^{11}-能够在表2的词中保留了下来？

首先来看亲属称谓词。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海南闽语(符其武，2008:236-249)，三亚(羊栏)迈话(欧阳觉亚等，2019:97-100)以及崖城军话(刘春陶，2011:31)等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中也存在前缀“阿(a-)”。例如：

表3　汉语方言前缀“阿”亲属称谓词举例

义项	祖父	祖母	父亲	母亲	伯父	姑妈	哥哥	姐姐	弟弟
海南闽语	阿公	阿婆	阿爸	阿妈	阿爹	阿母	阿哥	阿姐	阿弟
羊栏迈话	阿公	阿嬷	阿爸	阿姆	a^{33}ɓa^{13}	阿姑	大哥	大姐	兄弟
崖城军话	阿公	阿妈	阿爸	阿母	阿爹	阿娘	阿哥	阿姐	阿弟

同时，有不少亲属称谓词已经进入了回辉话。例如ʔa^{11}pa^{55}“父亲(阿爸)”，ʔa^{11}ma^{33}“母亲(阿妈)”，ʔa^{11}ɓa^{11}“伯父”，ʔa^{11}ze^{11}“叔父(阿爷)”，ʔa^{11}niaːŋ^{11}“叔母(阿娘)”，ʔa^{11}maːi^{11}“姑姑(阿姆)比父小”，“ʔa^{11}khiu^{55}“舅舅(阿舅)”，ʔa^{11}ko^{55}“哥哥(阿哥)”，ʔa^{11}saːu^{11}“嫂子(阿嫂)”，ʔa^{11}tɕiə^{55}“姐姐(阿姐)”等都是汉语借词。基于对比结果，可以肯定，正是在汉语的影响下，亲属称谓词中的ʔa^{11}-才得以保留。

接下来再看动物与人及鬼神的名词。通过对比，我们发现ʔa^{11}-在这些名词当中得到保留与语义有关：由ʔa^{11}-构成的这些名词所指称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人们不喜欢的事物。例如蛇、蛔虫、水蛭、蜈蚣、蝎子、蟑螂，蜣螂、虫子、蛄蝼、老鼠、狗；疯子、傻子、乞丐、懒汉、鬼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ʔa^{11}lo^{33}ko^{24}phia^{11}“乞丐特指汉族人”，lo^{33}为“汉人”，ko^{24}为“讨”，phia^{11}“米”，组合起来就是“要饭的汉人”。正常情况下，“汉人”回辉话为hu^{11}lo^{33}，但用于乞丐时，hu^{11}-就变成了ʔa^{11}-。发音人说，其中的原因是他们讨厌乞丐，而他们遇到的乞丐大多为汉人，所以他们就把hu^{11}lo^{33}“汉人”改成了ʔa^{11}lo^{33}“汉人”⑨。相反，不令他们讨厌的动物名词前一般没有ʔa^{11}-。例如kan^{33}“鱼”，nok^{24}“鸡”，tha^{11}“鸭子”，se^{33}“马”，mo^{33}“黄牛”，phe^{11}“羊”等名词前都没有ʔa^{11}-⑩。因此，可以确定，正是因为具有“令人讨厌”的意义，ʔa^{11}-才在语言中得以保留。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确定回辉话的名词前缀ʔa^{11}-并不是来源于某一个原始占语的词汇词(即不是像na^{11}-那样，来源于一个词中表达意义的最后一个音节)，而是来源于原始占语一批词中不表意义的第一音节。也就是说，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这些不表意义的第一音节趋同后

---

⑧　不能绝对地说每个双音节词都经历过Ca->ʔa^{11}-/a^{11}-的演变，可能有的词在完成*C_/-[*i/*u/*a]>Ca-后就脱落了，并没有经历Ca->ʔa^{11}-/a^{11}-的演变。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在整个占语中，第一音节的声母除了*ʔ、*h、*l、*s(>h)能够脱落外，其余的声母似乎并不容易脱落。(参看Thurgood，1999:76)

⑨　这种机制应是类推，因为lo^{33}“中国、汉人”在早期应不是双音节词(《占法词典》中记为lauv)。在中老年人回辉话中，ʔa^{11}-的这种用法很少，仅此一类(并且还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用)。

⑩　需要注意的是：讨不讨厌是相对的，与说这种语言的人的习俗有关。例如一般情况下汉族人并不讨厌狗，但是回辉人却讨厌狗，回辉人觉得狗比较脏，所以它们没有养狗的习惯。

形成了具有抽象意义的名词前缀。我们把不表意义的音节演变成具有抽象意义的词缀的过程叫作音节形态化⑪,回辉话名词前缀 ʔa^{11}-的形成正是音节形态化的结果。

3.3 前缀 hu^{11}-的来源与形成

在回辉话中,hu^{11}作前缀的情况比较复杂。具体情况如下:

种族:hu^{11}tsaːnʔ^{32}"回族",hu^{11}lo^{33}"汉族",hu^{11}laːiʔ^{32}"黎族",hu^{11}laːiʔ^{32}miau^{11}"苗族"

职业:hu^{11}khiu^{11}"医生",hu^{11}khiu^{11}"老师"

水果、果实:hu^{11}na^{11}"海果海边生长的",hu^{11}kua^{24}"香果",hu^{11}pia^{33}"腰果",hu^{11}ɗiau^{24}"圆果圆的、红的",hu^{11}mo^{33}"雷公果",hu^{11}ta^{24}"山竹",hu^{11}min^{33}"酸梅",hu^{11}mia^{33}"杨梅",hu^{11}thaːiʔ^{21}"谷粒",hu^{11}koi^{24}"橘子",hu^{11}tɕin^{33}liu^{11}"石榴",hu^{11}tsaːu^{11}"枣子",hu^{11}lau^{33}khak^{24}"核桃",hu^{11}mak^{42}"高粱",hu^{11}tin^{33}tu^{33}"玉米",hu^{11}san^{33}zi^{11}"辣椒",hu^{11}tɕioːŋʔ^{32}tsoŋ^{33}kok^{24}"茄子",hu^{11}tɕioːŋʔ^{32}zit^{24}pan^{42}"西红柿",hu^{11}tai^{11}"香蕉",hu^{11}lau^{33}tɕi^{33}"荔枝",hu^{11}ɲa^{24}"蓖麻"

身体器官:hu^{11}maːu^{11}"子宫",hu^{11}thoŋ^{11}"鼻子",hu^{11}khai^{11}"牙齿",hu^{11}ɓu^{24}"膝盖",hu^{11}me^{33}"乳房",hu^{11}noŋ^{33}"屁股",hu^{11}noːŋ^{11}"阴茎",hu^{11}mo^{11}"发髻",hu^{11}phaːu^{11}"斗圆形的指纹"

器物:hu^{11}ne^{55}"篮子用藤编的",hu^{11}sai^{11}"铁砧",hu^{11}khiə^{11}"瓢",hu^{11}sua^{24}"火柴",hu^{11}thiu^{11}"扣子",hu^{11}the^{11}"轮子",hu^{11}khien^{11}"钳子",hu^{11}ɗin^{11}"吹火筒",hu^{11}saŋ^{11}"秤砣"

蛋类:hu^{11}nok^{24}"鸡蛋",hu^{11}tha^{11}"鸭蛋"

疮:hu^{11}taŋ^{33}"水痘/疮长在脸上的"

自然物体:hu^{11}za^{24}"浪"

植物:hu^{11}ɕia^{33}"粘衣草",hu^{11}ɕio^{24}"长发草果子为圆形",hu^{11}kuaːnʔ^{32}"冠树树冠呈圆形",hu^{11}na^{11}tɕin^{33}tsau^{33}"枣树来自沙特阿拉伯一带"

动物:hu^{11}kiai^{33}"鹞子",hu^{11}mo^{33}"海螺",hu^{11}tau^{11}"虱子",hu^{11}phaːu^{11}"蜗牛"

前缀 hu^{11}-是不是也像 ʔa^{11}-一样是由原始占语的第一音节趋同后形成的呢?我们首先来看与占语同源词的比较材料(表4,见下页)。

从表4可以看出,hu^{11}-并不是由原始占语第一音节趋同后形成的。原因在于:

第一,在语音演变过程中,原始占语第一音节中的元音通常会演变成[a](如Ⅰ、Ⅲ类中CFD所示),并不是演变成[u]⑫。

第二,有些词根在原始占语中并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Ⅱ类)。

第三,有些词有 hu^{11}-与没有 hu^{11}-意思并不相同(Ⅲ类)⑬。如 hu^{11}sai^{11}"铁砧",sai^{11}"铁";hu^{11}the^{11}"车轮",the^{11}"车子";hu^{11}nok^{24}"鸡蛋",nok^{24}"鸡";hu^{11}tha^{11}"鸭蛋",tha^{11}"鸭子";hu^{11}ɲa^{24}"蓖麻",ɲa^{24}"油"等。

---

⑪ 音节形态化需要与"字化"(陈保亚,2015:327-330;宋作艳,2003)区分开来。虽然它们都是由不表意义的音节演变成语素,但是它们的演变动因(语言类型改变/"一字·一音节·一意义"语言格局规约)、演变对象(固有词/连绵词、外来词)、演变机制(趋同、对比提取/简缩、类推)、演变结果(词缀/词根)以及后续演变方向(脱落或声调/成词语素)并不相同("/"前为音节形态化的特征,"/"后为字化的特征),因此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演变现象。具体区别我们另文阐述,此处不展开讨论。

⑫ 也有演变成[u]的情况,但只发生在北拉格莱语中,并且只有在*r,*l,*m,*t之后才发生。(Thurgood,1999:110)如*ləmaʔ"油",在北拉格莱语中演变成lumāʔ,其中第一音节中的*ə演变成了[u]。换句话说,目前还没有发现表4中词语的第一音节元音都为[u]的情况。

⑬ 趋同形成的词缀去掉后词义并不改变。如 ʔa^{11}sau^{33}"狗",去掉 ʔa^{11}-后只是 sau^{33}不能单说,但是 sau^{33}仍具有"狗"的意义。

表 4　回辉话前缀 hu^{11}-名词与占语同源词的比较

类别	义项	PC	CFD	NR	PR	Chru	Rade	Tsat
Ⅰ	波浪	* riyaːʔ	rajak	——	rajaʔ	riaːʔ	jaʔ	$hu^{11}za^{24}$
	鼻子	* ʔiduŋ	aduŋ	idūk	aṭŭŋ	aduŋ	adŭŋ	$hu^{11}thoŋ^{11}$
	稻子	* paday	padai	padai	paṭaj	pədai	mdie	$hu^{11}thaːiʔ^{21}$
	蜗牛	* ʔabaw	——	abau	apaw	abau	abao	$hu^{11}phaːu^{11}$
	香蕉	* batɛy	patěi	pitəi	patĕj	pətəi	mtei	$hu^{11}tai^{11}$
	牙齿	* gigɛy	tagěi	digəi	takĕj	təgəi	egei	$hu^{11}khai^{11}$
	虱子	* kutɔw	gatǎu	kutəu	katɔ̌w	kətəu	ktâo	$hu^{11}tau^{11}$
Ⅱ	占族	* cam	cam	cap	cǎm	cam	cam	$hu^{11}tsaːnʔ^{32}$
	烟筒	* ɗiŋ	ɗiŋ	ɗit	ɗiŋ	ɗiŋ	ɗiŋ	$hu^{11}ɗin^{11}$
	茄子	* trɔŋ	trɔŋ	trok	trɔŋ	trɔŋ	trŏŋ	$hu^{11}tɕioːŋʔ^{32}$
Ⅲ	铁(铁砧)	* bəsɛy	baděi	pisəi	pathɛj	pəsəi	msei	$hu^{11}sai^{11}$
	车(车轮)	* radɛh	radɛh	radeh	riṭeh	rədɛh	edɛh	$hu^{11}the^{11}$
	鸡(鸡蛋)	* manuʔ	mənuk	manūʔ	mɨnŭʔ	mənŭʔ	mnŭ	$hu^{11}nok^{24}$
	鸭(鸭蛋)	* ʔada	adā	ada	aṭa	ada	ada	$hu^{11}tha^{11}$
	油(蓖麻)	* ləmaʔ	məɲok	lumāʔ	limɨ̆ʔ	ləmaʔ	emăʔ	$hu^{11}ɲa^{24}$

那么 hu^{11}-源于何处？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回辉人时常把 hu^{11}-读作[u^{11}]（除需要作区分外，本文统一记作 hu^{11}-），这从一些学者的记音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倪大白（1988）把“回辉人”记为 $u^{11}tsaːnʔ^{21}$，把“牙齿”记为 $u^{11}khai^{33}$，把“鼻子”记为 $u^{11}thuŋ^{11}$等。国际上也把“回辉人”称为 Utsat。这里的 u^{11}-或 U-也都可读作[hu^{11}]或[hu]。Pang（1998）认为 Utsat 中的 U-根源于南岛语，表示“人”，Utsat 就是“说回辉话（Tsat）的人”⑭。应该说，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不过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南岛语中还没有发现仅一个“u”就能表“人”这个意义的语言。换句话说，表“人”的 u-不应来源于表具体意义的音节。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在东、西部占语中表示种族的方式为“uraŋ‘人’+国家/种族”。比如 uraŋ prang“法国人（人+法国）”，uraŋ jawa“马来人（人+爪哇）”，uraŋ siem“暹罗人（人+暹罗）”，uraŋ kaling“印度人（人+印度）”，uraŋ kur“高棉人（人+高棉）”，uraŋ laow“中国人/汉族（人+中国）”等（Moussay，2006：103）。回辉话表式种族的方式与东、西部占语完全相同，也是“hu^{11}‘人’+国家/种族”。比如 $hu^{11}tsaːnʔ^{32}$“回族/占族（hu^{11}+占）”，$hu^{11}lo^{33}$“汉族（hu^{11}+中国）”，$hu^{11}laːiʔ^{32}$“黎族（hu^{11}+黎）”，$hu^{11}laːiʔ^{32}miau^{11}$“苗族（$hu^{11}$+苗）”等。也就是说，回辉话种族词中的 hu^{11}-应与“人”有关，应来源于原始占语的“人”。下表是“人”在原始占语及现代占语中的语音情况。

表 5　“人”在原始占语及现代占语中的语音

词项	PC	CFD	NR	PR	Chru	Rade	Tsat
人	* uraŋ	uraŋ/araŋ	usaːk	uraŋ	araːŋ	arăŋ	$zaːŋʔ^{32}$

“人”在原始占语中为 * uraŋ，回辉话的 hu^{11}-应来源于 * uraŋ 的第一音节 * u-。根据语音演变规则，* uraŋ 在回辉话中应演变成 $zaːŋʔ^{32}$，但是前缀为什么会选择 * u-而不选择 * raŋ

⑭ 根据 Mark Durie 的研究，Tsat 与 Cham 是同源词，表示“占族”的意思。（Pang，1998）从语音对应来看，Mark Durie 的观点是正确的。

(na^{11}-选择的是 * ina 中的 * na)呢？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现代回辉话中 hu^{11}-表示的意义更加抽象，只能表示种族与少数职业，而 zaːŋʔ^{32} 只能表示具体的“人”。例如 zaːŋʔ^{32}tuai^{33}“客人(人+客)”，ua^{11}zaːŋʔ^{32}“俩(两+人)”，zaːŋʔ^{32}naːiʔ^{21}“好人(人+好)”，zaːŋʔ^{32}pioːŋʔ^{32}“大人(人+大)”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表达抽象意义的需要，第一音节 * u-才被保留了下来。

在回辉话中“老师”与“医生”是一个词，都为 hu^{11}khiu^{11}。东、西部占语也一样，“老师”与“医生”都为 ɡru。从语音对应来看，khiu^{11}与 ɡru 是同源词。为什么“老师”与“医生”是同一个词呢？根据 Aymonier 和 Cabaton(1906:109)的注释来看，ɡru 不仅有“老师、医生”的意义，而且还有“有文化(lettré)、博学(savant)”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ɡru 与 jak 是同义词。有文化、博学的人可说成 uraŋ jak(人+有文化、博学的)(Aymonier 和 Cabaton，1906:109，142)。综合起来看，在东、西部占语及回辉话里，“老师”与“医生”同为一个词的原因应与他们通常都被认为是有文化、博学的人有关。因此，在回辉话中，hu^{11}khiu^{11}“老师、医生”应来自原始占语的 * uraŋ ɡru“有文化、博学的人(人+有文化、博学的)”，hu^{11}-也是来自 * uraŋ 的第一音节 * u-。

从语义来看，植物、动物、果实及器物等名词中的 hu^{11}-与种族、职业名词的 hu^{11}-来源应不相同，因为它们在语义上并没有关联。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hu^{11}-与原始占语的 * usar“种子”有关。下表是 * usar 在现代占语及回辉话中的语音。

表 6 “种子”在原始占语及现代占语中的语音⑮

词项	PC	CFD	Bih	Jarai	Haroi	PR	Rade	Tsat
种子	* usar	usar/athăr/asar	usăr	ăsar	asăl	athăr	asăr	saːnʔ^{32}

* usar 第一音节 * u-在各占语里基本上都演变成 a-了，并且词的意义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东、西部占语为例，usar/athăr/asar 具有“种子、谷物、籽粒、果核、精子，躯干中坚固的部分，心、胸脯，一个物体的主要部分”等意义。例如 usar məta“眼球”，athar kayău“树心”，asar panat“菠萝蜜”，asar ratak“豌豆、菜豆”，asar vah“钓鱼钩”，asar phau“子弹、铅弹”等。(Aymonier 和 Cabaton，1906:9，26，35)在回辉话里，hu^{11}-也主要用在种子，谷物，籽粒，身体器官以及物体(一种东西的主要部分)的名词当中。例如 hu^{11}thaːiʔ^{21}“谷粒”，hu^{11}tɕin^{33}liu^{11}“石榴”，hu^{11}mak^{42}“高粱”，hu^{11}tin^{33}tu^{33}“玉米”，hu^{11}me^{33}“乳房”，hu^{11}ɓu^{24}“膝盖”，hu^{11}sua^{24}“火柴”，hu^{11}saŋ^{11}“秤砣”等。

也就是说，从意义与构词方式来看，回辉话名词前缀 hu^{11}-应来源于原始占语 * usar 的第一音节 * u-。根据语音演变规则，回辉话 * u-应该丢失，其保留下来的原因跟 * uraŋ“人”中 * u-得到保留的原因一样：hu^{11}-只表抽象的意义，而由 * usar 第二音节演变成的 saːnʔ^{32} 只表具体的意义。例如 saːnʔ^{32}hu^{11}li^{11}“梨子仁”，saːnʔ^{32}hu^{11}noːŋ^{11}“睾丸”，saːnʔ^{32}ta^{33}“瞳仁”等中的 saːnʔ^{32}意义非常明确。也就是说，出于表达抽象意义的需要，* u-才得以保留下来。

在与东、西部占语的比较过程中，我们还发现由 poh/bauh/baoh(由 * bɔh 演变而来)构成

⑮ Thurgood(1999:346)认为 * usar 是来自印度的借词，并不是南岛语的词汇。他把这个词的原始占语形式构拟成 * ʔasar。但是这个词在毕河语(Bih)里是 usăr，(Nguyen，2013:48)在《占法词典》里有 usar/athăr/asar 三种形式，从语音演变的规律来看，a-应由 * u-演变而来，因为从原始占语到现代占语第一音节中的元音的演变规律为 * i/ * u/ * a>[a]。所以“种子”一词在原始占语中应构拟为 * usar。表中的毕河语(Bih)、嘉莱语(Jarai)以及哈罗依语(Haroi)都在越南境内，都是占语支的语言。

的词的意义与 hu^{11}-构成的词的意义完全相同。比如ṗoh mu'nŭ'"鸡蛋",ṗoh trŏng"茄子",baoh kruec"橘子",baoh patei"香蕉",bauh mau"泡沫/水泡/波浪",bauh radaih"车轮",ṗoh pông"水痘",ṗoh tyan"子宫"等(Aymonier 和 Cabaton,1906:343-344;Moussay,1971:329-330;Moussay,2006:104)。在回辉话里,这些词都是由 hu^{11}-与相对应的词根组成(见表 4)。这说明 hu^{11}-还承担了 * bɔh"水果,卵子、蛋"的意义。对于 hu^{11}-承担 * bɔh 意义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点:一是 * usar 与 * bɔh 意义相关(种子与果实相关,精子与卵子相关)。二是它们指称的对象在形状上基本相同(都是圆形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其他占语里还没有发现 * usar 与 * bɔh(更准确地说,是它们演变后的形式,如东、西部占语的 usar/athăr/asar 及ṗoh/bauh/baoh)构成的名词用来指称植物及动物,可见回辉话 hu^{11}çio^{24}"长发草果子为圆形",hu^{11}kuaːnʔ^{32}"冠树树冠呈圆形",hu^{11}na^{11}tçin^{33}tsau^{33}"枣树来自沙特阿拉伯一带";hu^{11}kiaiː^{33}"鹞子",hu^{11}mo^{33}"海螺",hu^{11}tau^{11}"虱子",hu^{11}phaːu^{11}"蜗牛"等词中的 hu^{11}是后来扩张形成的。扩张的原因应与这些植物及动物呈圆形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回辉话名词前缀 hu^{11}-应来源于原始占语 * uraŋ 与 * usar 中不表意义的第一音节 * u-。为了表达抽象的意义,不表意义的第一音节 * u-从多音节词中分离出来,与别的词根组合,变成了名词前缀。因此,词缀 hu^{11}-的形成也是音节形态化的结果⑯。

4. 前缀 na^{11}-、ʔa^{11}-、hu^{11}-在现代回辉话中的演变

一种形态形成以后其语音还可能不断磨损(在长度上缩短,在音质上向无标记音演变)或消失。Joseph 和 Janda(1988:196-197)把形态消失的现象称为去形态化(demorphologization),包括(重新)语音化(re/phonologization)与(重新)句法化(re/syntacticization)两个方面,前者指形态演变成单纯的语音片段,后者指形态演变成附缀或是词汇词。Hopper(1994)认为前者比后者要普遍得多,甚至提出了"今天的语音是昨天的形态"的论断。

形态经过语音化后,形态功能通常会消失,并与词根或词干融合后以单纯的语音形式存在于词汇词当中。例如古爱尔兰语动词词干通常能与表方向或地点的副词性前缀组合,并在演变中派生出新的动词。例如(Hopper 和 Traugott,2003/2005:173):

古爱尔兰语	现代爱尔兰语
to-theig"向一去"	tag-"来"
imb-theg"四处一走"	imigh"去,离开"
frith-to-theg"对着一向一走"	friotaigh"抵抗"

⑯ 词缀 hu^{11}-的形成需要与两种情况区分开来。一是与语音缩减(reduction)区分开来。语音缩减是词汇形态化过程中语音变化的主要方式,例如在 Basque 语里,noa"我将去",hoa"你将去",goaz"我们将去"中的前缀 n-,h-,g-分别来自代词 ni"我",hi"你"以及 gu"我们"。ni>n-,hi>h-以及 gu>g-是语音缩减的结果。(Trask,1996/2000:117)语音缩减的本质是一个词或语素在形态化的过程中一部分语音得到保留,而另一部分语音丢失了。通常情况下,丢失的语音是没有意义的,更不会单独成词。比如 ni>n-,丢失的 i 只是一个语音,并不表达任何意义,也不会独立成词。但是 * uraŋ 与 * usar 中的 * raŋ 与 * sar 是词根,它们在现代回辉话(zaːŋʔ^{32}与 saːnʔ^{32})中仍然具有意义,并且单独成词。二是与剪截(clipping)区分开来。剪截是从词中截取一部分,截取的这部分仍然是词,并且意义不变。例如从 telephone"电话"中截取 phone"电话",从 influenza"流感"截取 flu"流感",截取的 phone 与 flu 仍都是词,并且意义与原来词的意义完全相同。而 * uraŋ 与 * usar 中的 * u-在现代回辉话中不仅只能作词缀,而且与 * uraŋ 及 * usar 的意义也不相同。

fo-ad-gab“下面—朝着—拿” fog-“离开”

fo-gab“下面—拿” faigh“得到”

ad-ro-ber“朝着—为了—承受” abair“说”

因此在现代爱尔兰语中，人们再也不能从动词中分析出前缀了。换句话说，尽管前缀及功能消失，但前缀的部分语音片段还会在新词中留下一定的痕迹，例如 imigh“去，离开”中的 im-，friotaigh“抵抗”中的 fri-，fog-“离开”中的 fo-等。在分析大量的语言现象后，Hopper（1990，1994）认为语音化是语音产生（phonogenesis）及新词形成的主要方式。应该说，Joseph 和 Janda 以及 Hopper 等人的观察细致可信。不过他们分析的对象主要是非声调语言，对于声调语言只举了拉祜语（Lahu）的例子。在拉祜语中，一些动词的自动与使动主要是通过变换声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例如（马提索夫，2015）：

自动		使动		自动		使动	
dɔ̀	喝	tɔ	给喝	vɑ̀ʔ	躲藏	fɑ́	藏（东西）
jɔ̀	学习	jɔ	训练	və̀ʔ	穿	fɨ́	使穿
dɛ̀	停下	tɛ	放下	mɔ̀	看见	mɔ	给看
dû	挖	tū	埋葬	nɔ̂	醒	nɔ̄	叫醒
câ	吃	cā	喂	lɛ̀ʔ	舔	lɛ́	喂（动物）
tò̞ʔ	自燃（不及物）	tú	点燃	yɨ̀	睡觉	yɨ́	使睡

马提索夫认为上述使动词中的声调（及声母）跟自动词不同主要是因为这些自动词在原始藏缅语中存在使动前缀 * s-，这些不同的声调是 * s-在现代拉祜语中的残存。很明显，这个结论是从语言比较中得出的，并不是从活生生的语言演变中观察出来的。现在问题是，词缀脱落是否真的能够产生声调？如果能，新的声调是否只是新词语音结构的组成部分，不具有词缀的任何功能？下面是我们从回辉话中观察到的现象。

表 7　na^{11}-、$ʔa^{11}$-、hu^{11}-在现代回辉话中演变情况举例

词缀	词项	中老年回辉话	中年回辉话	青少年回辉话
na^{11}-	耳环	$na^{11}ɕi^{24}$	$na^{11}ɕi^{24}/ɕi^{14}$	$nə^{11}ɕi^{14}$
	耳朵	$na^{11}ŋa^{33}$	$na^{11}ŋa^{33}/ŋa^{13}$	$nə^{11}ŋɔ^{13}$
	钥匙	$na^{11}ɕi^{11}$	$na^{11}ɕi^{11}$	$nə^{11}ɕi^{11}$
	小刀	$na^{11}khiə^{55}$	$na^{11}khiə^{55}$	$nə^{11}khiə^{55}$
	饭锅	$na^{11}kho^{42}$	$na^{11}kho^{42}$	$nə^{11}kho^{42}$
$ʔa^{11}$-	虫子	$ʔa^{11}la^{24}$	$(ʔa^{11})la^{24}/la^{14}$	$lɔ^{14}$
	蛇	$ʔa^{11}la^{33}$	$(ʔa^{11})la^{33}/la^{13}$	$lɔ^{13}$
	蚂蚁	$ʔa^{11}than^{11}$	$(ʔa^{11})than^{11}$	$thaɪn^{11}$
	水蛭	$ʔa^{11}ta^{55}$	$(ʔa^{11})ta^{55}$	$tɔ^{55}$
	姑父比父小	$ʔa^{11}ma^{42}$	$(ʔa^{11})ma^{42}$	$mɔ^{42}$
hu^{11}-	鸡蛋	$hu^{11}nok^{24}$	$(hu^{11})nok^{24}/nok^{14}$	$nəuʔ^{14}$
	海螺	$hu^{11}mo^{33}$	$(hu^{11})mo^{33}/mo^{13}$	mo^{13}
	鸭蛋	$hu^{11}tha^{11}$	$(hu^{11})tha^{11}$	$thɔ^{11}$
	篮子用藤编的	$hu^{11}ne^{55}$	$(hu^{11})ne^{55}$	ne^{55}
	高粱	$hu^{11}mak^{42}$	$(hu^{11})mat^{42}$	$mɔʔ^{42}$

从表 7 可以看出，在青少年（25 岁以下）回辉话里，na^{11}-的语音已经磨损，[a]变成了[ə]，$ʔa^{11}$-与 hu^{11}-开始大量消失。$ʔa^{11}$-与 hu^{11}-的消失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产生了新的声调，系统中出现了新的声调对立。比如在中老年（45 岁以上）回辉话里，ʔa^{11}la^{24}“虫子”中的 la^{24}与 la^{24}“推”读音相同，ʔa^{11}la^{33}“蛇”中的 la^{33}与 la^{33}“下面”读音相同。但是在青少回辉话里，lɔ^{14}“虫子”与 lɔ^{24}“推”读音不同，lɔ^{13}“蛇”与 lɔ^{33}“下面”读音不同，lɔ^{14}“虫子”与 lɔ^{13}“蛇”读音不同，它们的不同都是由声调不同造成的。从中年回辉话可以看出，新声调（13 调与 14 调）的产生与 ʔa^{11}-和 hu^{11}-的脱落紧密相关，因为在中老年回辉话里，ʔa^{11}-与 hu^{11}-非常稳固，此时并没有出现新的声调。但是在中年回辉话里，前缀开始脱落，此时开始出现新的声调，不过此时发音人还没有意识到声调发生了变化。到了青少年回辉话里，ʔa^{11}-与 hu^{11}-大量脱落，词之间读音的不同完全通过声调的不同体现出来。

第二，ʔa^{11}-与 hu^{11}-的脱落导致它们的意义完全消失。尽管它们的脱落产生了新的声调，但是新的声调并不表达前缀的意义。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同前缀的词根变成了不同声调的词。例如 ʔa^{11}la^{24}“虫子”与 ʔa^{11}la^{33}“蛇”，一个变成了 14 调（lɔ^{14}“虫子”），一个变成了 13 调（lɔ^{13}“蛇”）。二是不同前缀的词根演变成了相同声调的词。例如 ʔa^{11}la^{24}“虫子”与 hu^{11}nok^{24}“鸡蛋”，前缀消失后都变成了 14 调（lɔ^{14}“虫子”与 nəuʔ^{14}“鸡蛋”）。换句话说，相同前缀的脱落并没有产生相同的声调。在这种情况下，ʔa^{11}-与 hu^{11}-的脱落就让它们的意义（ʔa^{11}-表“令人讨厌的”，hu^{11}-表“圆的”）完全消失了。

第三，ʔa^{11}-与 hu^{11}-的功能在部分词（词根为 24、33 调）里得到保留，在部分词（词根不是 24、33 调）中已经消失。ʔa^{11}-、hu^{11}-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构词（区别同音语素）。例如 nok^{24}是“鸡”，hu^{11}nok^{24}是“鸡蛋”；mo^{33}是“黄牛”，hu^{11}mo^{33}是“海螺”；la^{33}是“下面”，ʔa^{11}la^{33}是“蛇”；la^{24}是“推”，ʔa^{11}la^{24}是“虫子”，等等。尽管在青少回辉里 ʔa^{11}-与 hu^{11}-消失了，但是这些词通过声调仍然能够得到区分。可是另外一些词却不一样了。例如 than^{11}是“埋”，ʔa^{11}than^{11}是“蚂蚁”；ta^{55}是“生的”，ʔa^{11}ta^{55}是“水蛭”；tha^{11}是“鸭子”，hu^{11}tha^{11}是“鸭蛋”；phaːu^{11}是“水牛”，hu^{11}phaːu^{11}是“蜗牛”，等等。当 ʔa^{11}-与 hu^{11}-消失后，这些词都变成了同音词，这意味着 ʔa^{11}-与 hu^{11}-的功能在这些词中消失了。

根据现代回辉话的演变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新声调的产生似乎只与由音节（不表意义）演变来的词缀（ʔa^{11}-与 hu^{11}-）的变化（消失）有关，而与由词汇词演变来的词缀（na^{11}-）的变化无关。第二，在声调的语言中，词缀语音化后可能会产生新的声调，系统中形成新的声调对立。第三，新的声调并不能承担词缀的意义，但能承担它的部分功能。因此，就有声调的语言而言，语音化的结果与无声调的语言并不完全相同。

5. 余论

现有的经典理论基本上认为所有的词缀都来源于词汇词。但是回辉话名词前缀的来源告诉我们，由词汇词演变成词缀不是词缀形成的唯一方式，多音节词中不表意义的音节也会形成词缀。因此，如果从词汇词出发无法找到词缀的来源，应该变换思路，从语音（音节）出发去寻找。目前已有少数学者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李锦芳（1998）通过原始南岛语与乞央语言的对比，认为布央语的一些前缀可能来自于早期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覃晓航（1998）通过印尼语与壮语的对比，认为壮语的动词前缀应来源于原始壮侗语双音节动词的第一音节；潘悟云（2005）通过南岛语、南亚语以及古汉语的对比，认为汉语中诸如 * mraʔ-“马”、* ga-“胡”、* ka-“姑”等前缀（词头）应来源于双音节单纯词的第一音节。从回辉话的演变情况来看，应该说，不表意义的音节演变成词缀应是多音节语向单音节语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常规现象。

我们从回辉话中只观察到了不表意义的音节演变成前缀，相应的问题是：(1)小于音节的语音片段能否形成前缀？比如藏缅语族中某些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是否是前缀？如果是，它们来源于何处？再比如英语 glow、glimmer、glint 和 snore、snooze、snort 中的 gl-和 sn-是否是前缀⑰？如果是，它们又来源于何处？(2)不表意义的音节是否也可演变成后缀或者中缀？比如藏语的后缀-pa、-po、-ka、-wa 等(孙宏开等，2007：174)，英语 take 与 took 中的/ey/与/u/，⑱它们是来源于词汇词还是来源于不表意义的音节？

其他留待解决的问题是，从回辉话来看，新声调的产生只与由音节(不表意义)演变来的词缀的变化(消失)有关，而与由词汇词演变来的词缀的变化无关，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ʔa^{11}-与 hu^{11}-的消失只引起 24 调与 33 调产生分化，而没有引起其他声调产生分化？

参考文献

陈保亚　2015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商务印书馆。

符其武　2008　《琼北闽语词汇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江　荻　2010　《回辉语揭示的语言接触感染机制》，《民族语文》第 6 期。

李炳泽　1995　《回辉话的前缀》，《语言研究》第 2 期。

李锦芳　1998　《布央语前缀》，《语言研究》第 2 期。

刘春陶　2011　《崖城军话研究——海南少数民族语言包围中一种近代官话的源与流》，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刘丹青　2017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倪大白　1988　《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民族语文》第 2 期。

欧阳觉亚　郑贻青　1983　《海南岛崖县回族的回辉话》，《民族语文》第 1 期。

欧阳觉亚　江　荻　邹嘉彦　2019　《三亚迈话调查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潘悟云　2005　《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王士元主编、李保嘉译《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

宋作艳　2003　《字化与汉语限定关系字组的编码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孙宏开　胡增益　黄　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

覃晓航　1998　《从壮—印关系动词看壮语动词词头的来源及其原始双音节动词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田祥胜　2017　《从早期占语到现代回辉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田祥胜　陈保亚　2019　《海南三亚回辉语》，商务印书馆。

曾晓渝　尹世玮　2011　《回辉话的性质特点再探讨》，《民族语文》第 3 期。

詹姆斯　A.　马提索夫　2015　《藏缅语前缀的动态演化：澄清一些误解》，孙天心、田阡子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郑贻青　1986　《再谈回辉话的地位问题》，《民族语文》第 6 期。

郑贻青　1997　《回辉话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ymonier, Étienne and Antoine Cabaton　1906　*Dictionnaire Čam-Françai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Benedict, Paul K.　1941　A Cham colony on the Island of Hain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 129-

---

⑰ 从 Bloomfield(1933/1962：245)与 Harris(1951：177-178)的分析来看，gl-与 sn-应是前缀。

⑱ Hockett(1954)把/ey/与/u/分析为中缀(an infixed allomorph)。

134.

Bloomfield, Leonard 1933/1962 *Language*. London and Aylesbury: Compton Printing Ltd.

Delancey, Scott 1986 Toward a history of Tai classifier systems. In Colette Craig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437–45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Givón, Talmy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 394–415.

Harris, Zellig S. 1951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ckett, Charles F. 1954 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Word* 10(2–3): 210–234.

Hopper, Paul J. 1990 Where do words come from? In William Croft, Keith Denning, and Suzanne Kemmer (eds.), *Studies in Typology and Diachrony: Papers Presented to Joseph Gre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 151–16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opper, Paul J. 1994 Phonogenesis. In William Pagliuca (ed.),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29–4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2005 *Grammaticaliz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Joseph, Brian D. and Richard D. Janda 1988 The how and why of diachronic morphologization and demorphologization. In Michael Hammond and Michael Noonan (eds.), *Theoretical Morphology*, 193–210.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Moussay, Gérard 1971 *Dictionnaire Cǎm-Vietnamien-Français*. Phanrang: Centre Culturel Cǎm Trung-Tâm Vǎn-Hóa Cham.

Moussay, Gérard 2006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am*.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Nguyen, Tam Thi Minh 2013 *A Grammar of Bih*.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Pang, Keng-Fong 1998 On the ethnonym 'Utsat'. In David Thomas (ed.), *Papers in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No. 15: Further Chamic Studies*, 55–60.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arp, James A. and Y-Bhǎm Buôn-yǎ 1980 *A Rhade-English Dictionary with English-Rhade Finderlist*.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urgood, Graham 1999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Two Thousand Year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hurgood, Graham, Ela Thurgood and Li Fengxiang 2014 *A Grammatical Sketch of Hainan Cham*. Boston/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Trask, R. Larry 1996/2000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sound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9–25.

田祥胜　吉安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txspku@sina.cn